

【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智能时代“两个和解”思想的价值意蕴研究

孙秀成

(南京邮电大学 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两个和解”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矛盾而提出的重大命题。“两个和解”的最终实现要经历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推动“两个和解”的进程存在策略与路径的差异。“两个和解”在智能时代具有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而全面加强和着力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实现“两个和解”的全新的实践形态。

关键词:两个和解;智能时代;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D64;A811 **文章编号:**1673-5420(2019)06-0068-07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1]603}。“两个和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所造成严重危害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距今已超过170年。如今,人类已进入智能时代,“两个和解”对于指导社会发展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两个和解”思想的深刻内涵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工业社会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单纯地从科技角度考

察,工业革命无疑加速了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不断加深。自然生态的快速恶化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劣,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与对抗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资产阶级利用科技革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们在无限度地加剧对自然界的攫取、无限度地追逐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把人与人的矛盾的激化归咎于自然界本身。这不仅无法揭示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无法从根源上找到化解矛盾的方法与路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两个和解”的思想体系的阐释,深刻、彻底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错误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根源,并指出了共产主义是实现“两个和解”的最终社会形态。

(一)“两个和解”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相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矛盾的必然性而不是其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基本观点。

就自然与人的关系而言,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2]92}已经清楚地表明,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是生命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人类利用自然的合理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53}。进入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之后,人类试图利用不断革新的科学技术征服和主宰自然,通过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现资本的巨量增值。但人类改造自然的非理性行为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出现。表面上看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而不断深化,本质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益的无限追逐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剥削关系的存在。

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发现资本通过物的生产与交换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从“类”的角度去考察人与人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走出国门去寻找新的原料与市场。一旦一个民族或国家将“自我利益至上”奉为圭臬,那么民族矛盾与国家冲突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大国之间的追权逐利和民族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止,从英法百年战争到一战、二战,数千万人死于人类自身主导的行为。如果人把自然、把其他人(包括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都作为利益占有的对立面,把他们隔绝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体之外,那么人与自

然就无法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也就无法实现利益共享。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当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合二为一时,各种矛盾和冲突必将更加激烈和复杂,而矛盾的真正解决则要“通过人和人结成的共同体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的控制来实现”^[3]。

(二)“两个和解”的全面实现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81}。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认为共产主义将是人类最进步的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4]592}。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爆发了多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但是资本主义仍未走向终结。

“两个和解”最终形态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延缓了该历史进程:当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到伤及利益集团根本利益、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冲击时,资本的力量会主动回应社会需求,用改良的方式缓解矛盾。尽管这种缓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仍能维系并营造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表象。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和科技发展失衡移转“两个矛盾”物理空间的客观现实:经济的全球化不仅体现为产业与销售的链条遍布世界,也体现为基于科技发展的不同水平,世界不同地区在产业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和分工。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不断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人力密集型产业,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与此同时,依靠高附加值的科技进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通过普遍的高福利掩盖并缓和现实矛盾。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后,西方社会仍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生产力仍在不断提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仍然具备很大的弹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生产力的继续进步。

社会形态的变革取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而不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意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根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

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虽然在交替规律上共产主义的到来具有“铁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改变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两个和解”在智能时代的价值意蕴

人与自然的矛盾及人与自身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该问题做出的科学论断。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以来,“两类矛盾”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然不同,而矛盾的呈现方式则愈发复杂。简单而言,科技的发展从来都是双刃剑,在智能时代更为明显。智能社会的运转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蝴蝶效应”,如果人类的行为违反了自然规律和道德伦理,那么越强的科技推动力则意味着越大的破坏力。从个体的角度而言,人作为自然界最伟大的存在,能基于道德伦理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新技术不仅提升了人的“外部能力”,也重塑了人“内部”的心理结构。在技术的影响下,“人不再纯洁”^{[5]117}。模拟人脑神经元进行研发的人工智能,是否会使机器与人的主体界限发生偏移?人会否陷入技术性依赖?从“类”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正在打破国家间原有的经济技术格局和生产力结构,人工智能对政治活动(如“剑桥分析”公司通过政治营销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军事力量(如机器自主作战设备的研发)的深度影响,也将带来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国际力量的深刻变革。

进入智能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必将更加复杂。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2017年4月27日在北京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做视频演讲时提出,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对人类而言,“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最坏的(either the best thing, or the worst)”^[6]。在整个世界逐步走向互联互通、高度智能的背景下,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和“逆全球化”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新的社会思潮,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实现“两个和解”面临着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既是基于“两个和解”思想所形成的中国方案和实践形态,也是“两个和解”思想在智能时代的丰富与发展。

(一)“两个和解”思想是形成“两个共同体”倡议的理论指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383}。马

克思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8]82}。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特殊存在。人类出现后,在“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互生与互动构成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场景。“两个共同体”倡议的形成,在充分承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和实生物”“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思想中国化的成果。在理论脉络上,“两个共同体”倡议与“两个和解”思想一脉相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深刻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深入回答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9]106-107},进一步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要求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则着眼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宏大格局,揭示了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在最终关系上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表达,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具有同理性^[10]。

(二)“两个和解”思想是实践“两个共同体”倡议的价值依存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602}马克思将科学技术视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因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起到关键性作用。“两个共同体”倡议的提出,正是处于大数据分析、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之下。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成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204}。所有的信息都清楚地表明,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新技术的社会价值能否得到理性彰显,智能社会将走向何方都亟待正确的价值引领。前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社会也正面临着习总书记所指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西方为中心主导世界发展的大格局正在走向衰微,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正在进行剧烈调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社会矛盾也日趋深化和复杂。旧有力量绝不甘心发生结构性的权力转移,为继续保持资源的调配力和秩序的掌控力,霸权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必将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世界秩序仍面临坍塌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两个共同体”倡议在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的宏大视野下去寻求人与自然、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寻求不同利益主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沿着正确的价值指向,人类才能行进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三)“两个和解”思想是推动“两个共同体”倡议的范式基础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2}。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高理想即建立最终实现“两个和解”的社会形态,致力于人类最终的解放和自由。而“两个共同体”的倡议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的深刻总结。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开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通过短短70年的奋斗,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就。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国家实力大幅提升,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与新范式。

“两个共同体”倡议正是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两个和解”思想下着眼人类发展的中国方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13]522}当今世界正面临着5G和人工智能的重塑与再构,在能够实现“万物互联”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加持下,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时代”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期待发展、盼望繁荣,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共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即可得出这一判断。在世界格局大变动、大调整的当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冷战思维仍在四处作祟,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观尚在构建之中。中国作为处于第一方阵的社会主义国家,14亿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对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对共享文明成果的美好期待,对人类和谐共处与共同进步的不懈追求,形成了推动“两个和解”的重大力量,也提供了在智能时代实现“两个和解”的中国主张与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 皮家胜.“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现实意义[N].光明日报,2018-09-10(1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叶妮,王宏波.“乌托邦”与“实践性”: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物我关系[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6):113-119.
- [6] 霍金北京演讲:人工智能也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者[EB/OL].[2019-07-23].<http://news.cctv.com/2017/04/27/ARTIOCbLssHo71hk95cV4krI70427.shtml>.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吴海龙,韩璞庚.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实维度[J].东岳论丛,2018(10):102-107.
- [10] 周宗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实践与时代价值[EB/OL].[2019-07-24].<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29/c40531-31002108.html>.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楼启炜)

On the value of the “two reconciliation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SUN Xiucheng

(College of Automation & Colle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two reconciliations” is an important viewpoint put forward by Marx and Engels with regard to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an and himself that are necessarily caused by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ductive mea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two reconciliations” is a tortuous historical proces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trategies and paths to promoting it. And the “two reconciliations” has more profound value significanc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life 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the new practice forms to promoting the “two reconciliations”.

Key words: two reconciliations;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value implication